



栎树的囚徒

LI SHU DE QIU TU

蒋韵著

花城出版社



栎树的囚徒

蒋韵著

花城出版社

栎树的囚徒

蒋韵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新华书店经销

肇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肇庆市狮岗)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625印张 1插页 178,000字

1996年11月第1版 1996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60-2380-4

I·2047 定价:9.80元

如发现印装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谨 以 此 作

献给我最亲爱的祖母和外婆

——作 者

第一章 天空和鸟群

(天 菊)

我来到这个城市的时候，天下着雨。雨雾中火车停在了一片错落的灯光之中。叔叔拉着我的手，站在踏板的下面，叔叔说，来，别怕。我跳了下来。“陌生”这种黑色的东西顿时像寒冷的水一样淹没了我的双脚。

苏柳向我走来。吵吵嚷嚷拥挤不堪的月台就在那一刻突然安静了。灯光打在苏柳身上。她就这样在我命运的舞台上登场。在我和她以前及以后的全部联系中，也许唯有这一刻曾经像天眼一样照亮过我们的灵魂。

这个头发蓬乱、衣着丑陋的女人，只有在她登场的最初一刻，让我感到了一种不能言说的神秘、恐惧和美。

她站在了我面前。我们都不说话。这个雨夜在后来的记忆中总是有一种船一样的飘流之感。后来我听到了叔叔的声音。叔叔说：“天菊，这是妈妈。”

我清楚地看到那时的我。尽管隔了太远的路。我回首往事。我在回去的路上寻找着雨夜中那个7岁的孩子。那是一切苦难的开始。

从此我和苏柳、和T城这个城市齁齁的生活相遇。我身穿重孝。一双蒙了白粗布的鞋子早已被北方的雨水浸湿。苏柳把

它们扔掉了。她从我衣服上摘下了黑纱。没有什么比这个举动让我更疼痛地感受到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巨变。

在逐渐放晴的早晨我注视着苏柳。她脱离了我的想象变成一个非常奇怪的女人。我宁愿她冷漠、高傲，但她却让我想起任何一个街市上卖豆浆或者卖酱油的凡俗的妇女。她披头散发身穿一件大背心在肮脏的屋子里走来走去，她叼着牙刷满嘴白沫口齿不清地喝斥她的女儿，她说：

“起来起来，倒尿盆。”

6岁的张建红斩钉截铁地说：“今天不轮我。”

她走过去“啪”地一掌打在张建红盖了毛巾被的腿上，她说，“不轮你轮谁？”

就这样张建红在第一个早晨变成了我的敌人。她使我在这个陌生地域的生活变得更加难以忍受。我想她应该算是一个邪恶的孩子。她年仅6岁却有着36岁的女人才可能拥有的恶毒。她大睁着一双纯净的眼睛天真地注视着我，她说：

“你父亲是一个流氓。”

她选择了“父亲”这个词而不是爸爸。这使这场谈话拥有了一种早熟的气息。她明亮又美丽的眼睛在黑暗中像蝙蝠一样抚摸着我的惊恐和耻辱。她说：

“你是一个私生女。”

熄了灯的夜晚她就这样爬起来跪在我的枕边，俯看着我，像母亲俯看着一个婴儿。她那样和风细雨地告诉我一个事实：

“你是一个私生女。”

遗尿就是在那时候开始的。我在7岁的时候开始尿床。它总是源自一个相似的梦境，寒冷、黑暗、夜雨凄凄。苏柳为此逼迫我吃下去了许许多多奇怪的令人作呕的东西，但是从不奏效。我从梦中醒来发现被褥已是精湿一片，我大睁着眼睛一动

不动躺到天亮。我指望着我的体温能把它暖干。我指望着我的身体变成一只能够吸吮的巨大的熨斗。但是天亮了。

我怕极了那一声喊叫。这样的早晨张建红爬起来，一耸鼻子，冲着挂了一只白布帘的里屋喊：

“妈，妈，她又画地图了。”

苏柳冲出来，一把掀掉我身上的被子。现在我的身体半裸着与她绝望的眼睛相撞。它们发出的声响波涛一样淹没了我的听觉。我听不见张建红说什么，她弟弟张建国又说什么，他们说什么都不再重要，苏柳的绝望使我如坠深渊。我听见苏柳的心在说：

“我造了什么孽？”

这样一些黑沉沉的早晨永远没有太阳。我饿着肚子去上学。我从餐桌旁经过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叫我。苏柳装做很忙的样子。她用远比平时更为尖利的声音喝斥着张建红或者张建国。她从不喝斥我。她只是说：

“把褥子晾到外面去吧。”

我晾出去被褥。现在大家都知道了我的耻辱。我们居住的地方是没有秘密的。那是一个兴建于50年代初期的简陋的宿舍院儿，三大排青砖灰瓦的平房构成了它呆板贫弱的布局。生活其间的人时间久了慢慢就丧失掉了想象力，变得乏味。这样的人群聚在一起总是没有深邃的话题。

我晾好被褥，就去上学了。我知道人们在我背后指指点点。还会有人跑到苏柳那儿去提供新的偏方。它们一次比一次更让人恶心和难以下咽。它们永远不会奏效的。我知道这个。我知道了这个比抱有希望更让我难过。我是多么想抱有希望呵。

路过太平间的时候，有人在哭。这是我每天上学必经的一个去处。这个太平间的后门紧临一条有槐树的背街。通常它总

是紧锁着。一旦打开了那就是死了人。它的门漆成绿色。

后来，在 1966 年到来的时候，它就被漆成红色了。上面还书写了毛主席的语录：“人总是要死的，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我到达这个城市的时候，距离 1966 年还有一段路程。我眺望不到那个地方。我毕竟只有 7 岁。我尿床，孤苦伶仃。太平间里的哭声总是能够毫不费力地抵达我心里最脆弱的那个地方。它们直达那里就像识途的老马。我想起去世的祖母。别人哀吊的哭声带我回家。我回到了过去的日子。我看到祖母怎样跪在河边，洗着小山一样的衣裳。我坐在她身边，嘴里含着一颗青橄榄。

无帆的木船从我们眼前驶过。太阳总是照着一条不知流向哪里去的长河。

有着绿漆木门的太平间唤起我的乡愁。在这个到处是灰尘和煤烟的城市只有这一个衰草遍地的悲情之地仿佛是我的家园。我从不像别的孩子那样惧怕这里。有关太平间的种种传说从来没有真正吓倒过我。当它紧闭门户的时候我想象着那里的情景。有一天我真的走了进去。我看见门开着，没人知道门为什么在那一时刻洞开。那本来是太平无事的一天。但是门开了，我走了进去。

现在我仍然看得见夕阳西下时分站在一片衰草之中的那个 7 岁的孩子。她站在死亡的羁留之地。她惊讶这里怎么毫无出奇之处。她穿过一间空旷的房屋来到一个更加空旷的院子，然后她就看见了那一片衰草。那一片凡俗的野草生机勃勃滋滋有声地吮吮着死亡的养料。屋子里有张木板床，院子里有一棵树。不是杨树，不是柳树，也不是槐树、榆树。以她有限的植物的常识她叫不出它的名字。它就是一棵树。一棵老树。也许这是唯

一神秘的地方。一棵不是杨树不是柳树不是榆树也不是槐树的树长在那里。那么它也许就是“树”的灵魂。

后来她听见了哼哼的声音。从倒塌的墙头她看到了一墙之隔的那个猪圈。一群小猪拱在了母亲的身下。衣食无忧乐天知命的母亲闭着眼睛在唱它们自己歌颂生活的歌。那是一只“乌克兰”。

她默默站了一会儿就走了出去。她承认这是一次失望的寻找。

一个孩子站在那里，惊讶地看着她。那个孩子说：

“你在那里干什么？”

那个黄昏我就这样认识了我在这个城市里的第一个朋友。我从绿门里走了出来，一眼就看见了她。她站在夕照之中有一种奇异的美丽。后来我发现那只不过是一种错觉。

她说：“你在那里干什么？”

我犹豫了一会儿。我本来可以不回答。但我喜欢她说话的声调和神情。我在一霎间拿她和张建红做了比较。我可以想象此刻要是张建红站在我面前那会是怎样一番情景。于是我老老实实在地说：

“没干什么。”

“可我看见你从里面出来，”她说，“里面有什么？”

“有一张床，”我说，“还有一些草。一群猪。”

“猪？真的是猪？你看清楚了？”

“看清楚了。”我回答。

“这怎么可能呢？不可能，”她斩钉截铁地摇着头，“决不可能是猪。”

我犹豫了。我突然遇到了一个难题。我刚才看到了什么顷刻间成为一个疑团。我回望绿门。我刚才随手掩住了它。现在

它遮住了我的视线。我忽然失去了重新走进去的勇气。

我听到我的朋友说：“它们是白色的还是黑色的？”

我说：“白色的。白色的乌克兰。”

“那就对了，”我的朋友如释重负地笑起来，“那准是吊死鬼变的。”

我就这样认识了这个叫做冯明玉的女孩儿。当她走出黄昏之后我发现她其实并不美丽。她甚至可以说是丑陋的。她长着一颗极其悲哀的大头。在下雨的日子里人家就拿她的大头取笑。也许她到18岁的时候会出落成一个不错的姑娘，因为我用40岁的眼睛很容易发现她身上潜在的美好的素质，比如她的眼睛，她的牙齿和脖子。但是她失去了成为一个不错的18岁少女的机会。她自己在生命的路上弄丢了它。

她的母亲是一个终日病病歪歪的女人。这个女人躺在棉被下面就像一朵羽毛。但是那被子却是血红的。血红的一床缎被，上面绣着丹凤朝阳的图案。她家在我们那个青砖灰瓦的平房院里拥有着三间住房，很少有人走进去做客。我是说普通的人。但是却有许多达官贵人常常光顾那里，他们灰色的伏尔加或者华沙停在花栏墙外，然后走下一些气宇轩昂的男女，来找冯明玉的父亲看病。

冯九如先生是一个名医。悬壶济世，却总是医不好自己的老婆。我总是看见冯明玉在厨房的炭火上为她母亲煎药。这种时候只有我们两人钻在黑黝黝的小房里，药香四溢，它们袅袅的白雾温暖了我不幸的童年。

它像个孤堡，我是指那小房。建在山上，四面环水。吊桥永远收着，与世隔绝。这是一个使我感到安全和快慰的想象。我们面对面坐着，膝盖碰着膝盖，局促的空间使我们亲密。听她说话是我最快乐的事，不管她说什么。她的话在我听来总是十

分深奥。她说她恨她的家，恨她的爸爸和妈妈。这可真让我吃惊。她说他们是世界上最自私和冷漠的人。

“你知道吗？她根本没病，她很健康，她只是希望人伺候她，”她说，“她是在惩罚我爸爸。”

“为什么？”

“因为他总是不碰她。”

我模模糊糊看到了一个奇怪的大人世界，荒诞不经，却又有魅力。就像恐怖又诱人的鬼故事。这使小屋变得诡谲。我向前探探身子，抱紧了我自己。这样她呼出的热气就喷到了我脸上。她注视着我，她的眼睛就像两条水中的黑鱼。她说，“告诉你一句话，你长大了，千万不要结婚。那很脏，懂吗？”

我点点头，其实我不懂，一点也不懂。我很糊涂，但那很诱人。

一种花朵般的感觉在我身体里慢慢绽放。我们对望，膝盖碰着膝盖。她忽然说起蚊子。她说昨夜有只蚊子钻进了她的蚊帐，叮了她身上许多包。“哪，这儿，这儿。”她一边说一边在她身上的部位指点着，“你看。”

我摇头。脸忽然红了。

她笑起来。她说出一句使我倍感意外的话，她说：“你是我见过的最干净的人，你将来会得洁癖。”

我说不，我一点儿不干净。我是脏的。我尿床，我每天要吃那些非常恶心和肮脏的偏方。我身体里全是脏的。我忽然很辛酸，我哭了。这是我第一次和人诉说我的耻辱。T城弄脏了我。这里的生活弄脏了我。张建红弄脏了我。我哭得很伤心。她忽然伸手抚摸我的脸。这陌生、突兀和亲昵的举止唤起我内心一种奇怪的感觉。我不再哭泣。她大睁着黑鱼似的眼睛，慢慢伸直身子和腿。然后我就看见了那个更加奇怪的举动。

多年后我知道了那是怎么一回事，可那时我不懂。我看她整个身子可怕地抖着，抖着。那痉挛似的抖动吓坏了我。那急促的喘息吓坏了我。我真恐惧。我以为她突然病了。我一迭声叫着她的名字，我说：“你怎么了怎么了？”我的喊叫一直到她嘴里发出一声呻吟来才终止。她长长地呻吟一声，紧绷的颤抖的身子忽然像棉花一样瘫软下来，她说：“天菊我要死了。”然后就哭起来。

我抱住了她。我感觉到她正在我怀里融化，就像雪人在阳光下慢慢融化一样。她抽抽嗒嗒哭着。她说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管不住我自己。我知道这很羞耻。我经常这样一点办法也没有，我大概快要死了。她说天菊我要死了。你看见了吧天菊我就要死了。

我们抱着，流着眼泪。小屋闷热不堪。我们彼此知道了对方的秘密，那是羞耻的、绝望的。我们为羞耻和绝望而哭，没有谁能帮助我们，我们孤独无助。可同时我们又是快乐的。因为我们拥有同样的羞耻和绝望的困境。我们响亮地哭泣。我们不知道又到了蚊子即将猖獗的黄昏，太阳就要落山了，蚊子就要出动了，夜合欢就要开了，晚霞就要烧起来了。这个黄昏和哭泣将给予我海市蜃楼般的温暖。

但是回到家里我却必须面对苏柳的那些偏方。它们变得更加肮脏和难以下咽。苏柳端来了用猪尿泡炮制出来的米饭。苏柳站在我对面看我一口一口把它们吞咽了下去。我一边吃一边哭。那是我第一次在苏柳面前掉眼泪。

苏柳说：“你不用总是这一副受尽虐待的样子。你做出这副样子给谁看？”

我抹了一把泪水，却有更多的泪汹涌地流出来。我身体里的水坝就这样崩溃了。到夜晚，不用说我又尿了床。这次我挨

了打。苏柳第一次打我。苏柳的猪尿泡米饭败下阵后就只能打我了。我像只小狗一样蜷在床上，苏柳挥舞着鸡毛掸子抽着我赤裸的双腿。张建红端坐在她的枕头上，像过节一样快乐。

我和苏柳之间那一种小心翼翼维护的奇怪的距离在这个早晨荡然无存。苏柳跨越了它们感到一种由衷的轻松。在这之前她一直无法面对我。苏柳突然之间卸下了她的铠甲，她心里冰封的仇恨终于像融雪的河流一样泛滥。这是一个有阳光和鸟鸣的早晨，苏柳在这个美好的早晨获得了自由。

她做出的第一个决定就是将我逐出那两间简陋的睡房。在对面原本做厨房的小屋里，支起一块铺板。做为我尿床的惩罚，我被放逐到了他们的生活之外。在那间不足4平方米的没有顶棚的小屋里我住了7年。我的床板就支在高高的灶台上。我7岁的时候爬上爬下总是感到吃力。我坐在床边，双脚高高脱离地面，我觉得自己仿佛置身在一座四面环水寂静无人的白色的吊桥。

在星期的时候张建红和张建国就跟随他们的父亲去拣碎砖头。他们在附近的工地上转来转去，我被排斥在这种劳动之外。有一天他们自己动手搭起一座棚子。这座由青色和红色半头砖以及油毡搭成的建筑就紧靠在我的小屋外面。油毡上钉了木条。我的唯一有扇小窗的墙壁做了它的山墙。我失去了阳光和风。在后来7年的时间里，做饭的油烟和炭火气充填了我的肺部。我感觉到它在我的身体里就像一只渐渐膨胀的气垫船。

我的母亲苏柳现在可以理直气壮地向邻居们陈述一个事实。苏柳说，“她尿床。”苏柳说连猪尿泡米饭都不顶事了。苏柳说我拿她真没办法但她内心却获得了一种终于可以倾泻的自由。苏柳得救了。她的身体在很短的时间内拥有了流动的美丽姿态。阳光抚摸着她。我的尚还年轻的母亲挣扎在人世中的情

景在后来流逝的岁月中总是让我联想到一尾落网的鱼。

奇怪的事情出现了。差不多在我搬进小屋的第一天，遗尿的毛病不治自愈。我梦见了一个女人。她没有一点色彩地站在我的床边。她几乎是透明地凝视着我。她用凝视抚摸着我的伤痛。我忽然醒了，内心一片清明。我听见了夜的声音。它们像海浪一样轻轻推涌着我。就在那时我知道我的病痊愈了。

虽然时间使一切发生改变可我还得承认，我就是那个叫做天菊的孩子。我出生的故事隐藏着一个有伤风化的秘密。那可能是一个事实也可能是一段猜想。我7岁的时候失去了祖母。然后我来到了这个北方城市。我在一个雨夜抵达这里。火车悲伤的鸣叫从此就留在了我的梦中。在我长大以后，我仍然看得见那个叫天菊的孩子怎样沿着铁轨想走回7岁以前的过去。

收到那封简短的南方来信应该是在阳历4月。天气还很寒冷。虽然柳树和野草都已经绿了可真正的春天还没有到来。西伯利亚的寒流在贝加尔湖流浪着还在伺机袭击这个4月的北方城市。

所有的孩子们都穿着臃肿的棉衣。

一个在很多年前被人称做“范先生”的男人此时活动在黄河流域北部外长城一带。从这个城市出发，往北，再往北，有无数的山峦，无数的关隘，无数的战争记忆。残存的烽火台，常常孤单地闯进一个行路人的视野。如果这个人手持洛阳铲，在漠漠长风中寻找着古代墓葬，那么总有一天他会在这个北方故事中和我相遇。

不过苏柳在那个寒冷的4月收到的是一封南方来信。它破坏了她的生活。在应该做晚饭的时候她仍然呆坐在他们的床上。她睁着一双纷乱的眼睛。张建红和张建国在外屋连声喊饿。她

好像没有听见。后来他们从食橱里找出一只冷馒头分吃了。在喝水的时候，张建国打碎了一只瓷碗。

粉碎声中苏柳想，它破坏了我的生活。

张松川在7点20分骑车抵家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副黑暗的情景。屋子里没有灯光。他的皮鞋喀嚓喀嚓踩在了碎瓷片上。他说，“怎么连灯也不开？”

这个身上总是有粉笔灰的男人很快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他读了南方来信之后没有说话。

他坐了一会儿就出去做饭。他在那一晚煮了一锅“和子饭”，里面切了大块大块的山药。然后他就和张建红张建国一起坐下来，他们围着一碟咸菜吃得津津有味，他们“呼噜呼噜”的声音使这个没有财产的房间里充斥了一种简单却又深刻入骨的春水融融的温暖。

夜里他没有碰她。他们彼此知道这是一个不眠的耿耿长夜。他僵硬地躺在那里听她辗转。后来她坐起来，点了一枝烟。她说：

“我们该怎么办？”

我的母亲苏柳冷冷的声音里隐藏了多少屈辱和哀求这个男人心里自然明镜高悬。劣质香烟的气味使他心生怜悯。他终于说话了，他说：

“还能怎么办呢？就那么办吧。”

“那行吗？”苏柳说。

“你有更好的办法吗？”张松川冷冷地问。

“没有。”苏柳回答。

“那还能怎么办呢？”张松川说，“就那么办吧。”

就这样在接到我祖母临终前的来信后他们决定了我的命运。我在南方家乡小镇守灵的夜晚我母亲夜夜吸着劣质的香烟，

往事使她疼痛。16岁的苏柳在为我外婆送葬的路上看到了灿若星辰的野菊。它们美丽的身影更行更远照亮了我外婆关氏最后的道路。几年后，在我初降人世，我母亲除了留给我“天菊”这个名字之外，什么都没有给我。而这个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名字显然给我带来了黑暗的命运。

苏柳一生中第二个男人是一个数学教师。他能够成为苏柳的丈夫是因为他胸无大志碌碌无为。苏柳是那样一种女人，当她选择了一个平庸的男人而惨遭不幸之后，那么她必定要走向一个平庸的男人以藉求安全和幸运。

公平地说张松川对苏柳做到了仁至义尽。他甚至接纳了我，尽管他不情愿。但是有哪一个男人能够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个呢？在我到来之前的一段日子里，他心事重重，郁郁寡欢。他内心经历的一切甚至被苏柳所忽略。有一天他看到张建红在玩一个游戏，那个6岁的孩子拣起一串槐叶，然后她把叶子一片一片地揪下来，揪一片，嘴里说，“升班。”再揪一片，又说，“退班。”后来人们就看到张松川在手里摆弄起了这个孩子们的游戏，他揪下一片槐叶，心里说，“来。”再揪一片，又说，“不来。”当枝上只剩孤独的一片叶子时，那一片叶子是“来”。

他突然热衷起报纸和广播中有关火车或者轮船出事的报道。遗憾的是这一类报道几乎凤毛麟角。倒是民间中时有传闻，说是哪里的火车出轨，哪一个扳道工扳错了道岔。有一天晚饭时他突然讲起了这一类的传闻，他说有一个扳道工喝醉了酒，他该把道岔往左扳谁知却扳到了右边，其结果导致一列南来的火车与一列货车相撞。那一场有如神助的熊熊大火，照亮了他们这所亲人相聚的黯淡的房间。

但是我终于来了。

我最初走进他们的生活时忽略了别人的感受。我只注意到我的不幸。我怜悯我自己。因为我知道没有其他人怜悯我。那时我不可能理解我的继父的不幸。我面对着一个使我心生畏惧的陌生男人，我与他毫无关系却住进了他的家中。在我最初的记忆里，他行为古怪。他像怕蛇一样怕碎头发。梳子上、脸盆边上，或者随便什么地方，要是有了脱落的头发他就会大发脾气。星期天他至少要扫五次地板，还要用水拖把拖两次。如果你认为他患有洁癖，那就又错了，他两个星期换一次衬衣，一个月也不洗一次澡。在他热衷于扫碎头发的同时，我家墙壁上却结着密密的图案复杂的蛛网。

1978年我的继父张松川再婚的时候，他已经和我的母亲苏柳分手10年。他过了10年鳏居的日子终于走向一个叫田桂林的女人。这个女人是理发师。他的晚年最终陷落在碎头发的包围之中。但他生活得其乐融融。他甚至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著书立说，他写了两本小册子，一册叫做《中学数学疑难问题汇编》，小16开本，全书共计86页。另一册出人意料，叫做《老张玩具》，这本共计64页的书中介绍了90种玩具的做法，其中包括：

雪糕棒制作的风车、废药瓶制作的狗熊、易拉罐制作的卡通人物等等。那是我继父晚年生活幸福的证明。

于是我再也无法逾越1968年了。我不可避免地接近了它。我看见那个灰暗的日子像丛林猛兽一般守护在我通往回忆的路上。我尽可能冷静、理智、不加表情地去描述它，我尽可能使自己的描述从纷繁走向简洁。现在我已经无法断定，那是否真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我看见苏柳走出了家门，她手持一把大扫帚的情形是两年来这条街道上的人们所见惯的风景。

那些日子总是由我来做早饭。我煮了一锅小米汤，里面拍